

## 古代文学研究二重、三重证据法及其他

邓乔彬

(暨南大学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 以作为文献的“纸上材料”与考古所得的“地下之新材料”相结合, 将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 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科学新方法相结合, “不屈旧以就新, 亦不绌新以从旧”, 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当代学者叶舒宪提出了“三重证据法”, 即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来论证古代文化, 用外国的、世界的东西来论证中国的情况。笔者认为“三重证据法”的名词或可质疑, 但用文化人类学来“破译”古代文化所取得的实绩确实是令人振奋的。若不为名词所限, 本着闻一多、郑振铎等前辈学者的开创精神, 在当代学者勇于探索的启发下, 尽管不采用“三重证据法”的说法, 或不限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但沿着文化学的研究路子, 应该可以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继续有所创造, 有所建树。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陈寅恪等学术大师们研究古代文学的方法和成就, 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

**关键词:** 二重证据法; 三重证据法; 古代文学; 文化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13X(2004)01-0005-05

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界曾有过方法论热, 可是, 在热过一阵以后, 我们不能不痛苦地发现, 新三论、老三论等自然科学方法是很难真正贴切、深入地进入文学, 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更是如此。到了90年代, 古代文学研究虽然如美学的研究、社会学的研究、心理学的研究、阐释学的研究、结构主义研究、符号学研究、语义学研究、历史学研究、哲学研究, 直到文化学的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等等, 都有人在尝试, 也有不少成果, 但是, 鲜有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取得引人注目的研究实绩并以此表明新方法的成功者, 而且似乎连前一阵子很风行的宏观研究都被讥为肤浅、大而无当。一时间, 文献学及其具体成果受到异常的重视, “回到乾嘉”尽管不是口号, 却为不少人所实际奉行和艳羡, 我们似乎又看到了胡适之先生当年“拿出材料来”的理直气壮的样子。

确实, 古典文学是有其学科的特殊性, 而传统的学科如何跟上现代的步伐, 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在对先秦文学的研究中, 萧兵、叶舒宪等先生所进行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 以及一系列相关成果, 的确受到了学界、尤其是年轻一代和国外学者的注意, 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相关成果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尽管他们的研究似乎还难以成为古典文学界的主流和主导(当与他们所研究对象的时段性、特殊性有关), 但是, 他们的成就确实值得我们很好地思考, 应当对当前及今后的研究有所启示。

叶舒宪以“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学的更新”作为其《诗经的文化破译》一书的自序, 很明确地提出了方法论的更新问题。他说:

考据学是我国传统学术的根基, 从汉代至清, 已经延续了两千年, 其基本方法大致未变。有清一代考据学(又称朴学)大盛, 人才辈出, 取得了几乎是空前绝后的乾嘉学派的伟大成就。说它空前, 因为不论在方法的谨严、知识的博洽, 还是在立论的精当、见解的深邃方面, 这一派都显示出超越古人的明显优势; 说它绝后, 是因为该派学者的素养、功力和学风在中华学术史上有其难以企及性和不可重复性。这倒不是说后人智力不如清人, 而是社会条件的变更使那种三岁读经的教育方式一去不返, 以小学为基础和核心的考据学在白话文的新时代必然面临前所未有的衰微大势, 这正所谓“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不是任何个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

因此, 他阐发了对国学传统的更新和发展的见解。认为, “从总体上看, 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 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 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并例举了王国维所说, 即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下面先谈谈这一问题。

### 一、关于“二重证据法”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sup>[1]P.303</sup>中指出: 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可见, “问题意识”和材料发现对于进行学术研究是何等的重要! 而被陈寅恪以“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推崇之至的王国维先生, 则很重视用材料来解决问题。

王国维曾极其关注19世纪末在河南安阳发现的殷墟甲骨卜辞, 并根据其解读成果, 在1925年于清华研究院讲

《古史新证》的第一章《总论》<sup>[2]P.2</sup>时,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以断言也。

可见,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指作为文献的“纸上材料”和考古所得的“地下之新材料”。由于王国维在这里是特指先秦学术的研究,所以“纸上材料”应该指先秦诸子和先秦历史著作,以及晋朝所发现的《竹书纪年》(其实《竹书纪年》也是地下之材料,只不过不是新的而已)等;“地下之新材料”是指以殷墟发掘的甲骨文卜辞为代表的考古所得。王国维就是利用考古所得的新材料完成了重要的著作《古史新证》以及一系列重要著作。

我们知道,“五四”以来,在胡适等人的疑古思想影响下,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认为,古籍所记载的古代史和传说,由于后代不断地添加和附会,造成了越古而越不可靠的情况,这就是“层累的历史造成说”,认为应该用考古学、民俗学等方法去确立真正科学的古代史。由于夏朝考古资料的缺乏,顾颉刚就否定了大禹的存在,鲁迅在《故事新编·理水》里所写的说“禹是一条虫”的学者,就是讽刺顾颉刚。顾颉刚等人认为,战国和秦汉时期是伪造古人古事最多的时代,而王国维就通过新近的地下考古发掘所得,证明了春秋时期已有关于大禹的记载,并非战国以后人之所托。这种谨慎的态度,小心的求证,无疑是更值得推崇的。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主要特点是:将传统的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与西方在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产生的科学新方法结合起来,而“地下新材料”和纸上文献的并重,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的互为表里,就能做到“不屈旧以就,亦不绌新以从旧”。王国维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确实是前辈和同辈学者所无法比拟的。

我们现在一般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往往都只注意到王国维早年所从事的文学研究,注重他将西方的悲剧观、理念说等等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评判中,写成了著名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当然,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称道不已的,因为这些确实是在上个世纪初开学术风气的重要著作。但是,我们更应看到,王国维先生运用“二重证据法”,不仅对文学史后半段俗文学的词曲小说研究作出了全新的贡献,而且对先秦时代历史、制度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发明、发现,确立了他在史学界的重要地位。

以王国维的文字学研究来说,他不是像乾嘉学派的学者那样,只注重文字的考释,而是进而探讨古代的历史、地理、礼制等。如甲骨文研究,除著名《殷周制度论》以外,还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卜辞中所见地名考》等。他第一次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的可靠性,又据卜辞加以纠正。

如金文研究,他不仅对宋代以来的金文资料进行了全面整理,又将金文资料用于西周历史研究,写成了《鬼方、昆夷、玁狁考》、《生霸死霸考》、《明堂庙寝通考》等,还进行了古器物的研究考订。此外,他对简牍的研究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对20世纪学术史的影响是很大的。颇有意思的是:王国维在1927年自沉昆明湖,一代学术巨星陨落。第二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中国开始有了现代意义的考古学。除了殷墟发掘还在继续外,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发现,1930年梁思永对龙山文化的发现,以及其后对安阳后岗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三迭层的发现等,都是重要的新石器文化发现和断代文化发现。而解放前20年和解放后半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学所取得的成绩,无疑以其“地下之新材料”证明“纸上材料”,对历史学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以至于今天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能取得显著的成绩,也是与前人的这些工作分不开的。仅以楚文化堆积较多的长沙地区而言:对1949年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的《夔凤人物图》、1973年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御龙图》,这两者对中国绘画史意味着填补了战国时代,亦即先秦时代绘画发现的空白;“文化革命”期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文物之丰富,更填补了西汉史研究许多领域的空白;近年出土的三国时期的竹简,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研究中,“二重证据法”的作用是确凿无疑。而对于古典文学来说,“地下之新材料”的发现,当然也推动了研究的进程。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如甲骨文是文字学家在中药的“龙骨”中偶然发现的一样,差不多同时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也是无知的王道士在无意中发现的。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学者的劫掠式的盗运,使得敦煌文物大量流失于国外。但是,从此就出现了一个学术界的新名词“敦煌学”,其中就包含着许多属于文学范围内的学术研究材料。仅以“敦煌曲子词”为例,许多现代学者都曾作过研究,其中如著名的词曲专家任中敏就此而进行过很长时间的 research,从以任二北之名(二北是因其早年推崇北宋词和北曲)编《敦煌曲初探》(1954年出版),到以任半塘之名(之改为半塘是因为倾心于唐代的音乐文学系列研究)编著成《敦煌歌辞总编》(1987年出版),后者对前者所持议论已有很大改动。

## 二、关于“三重证据法”

叶舒宪先生认为,王国维先生以后的学者,尽管已经尝试着动用第三重证据的方法,但却未能像王国维那样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明确提出“三重”乃至“多重证据法”的方法原则。他说,如果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同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稍加对照,“二重”到“三重”的演进轨迹可谓一目了然,而“三重”主要体现在对国外著作的重视,表现出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思路。

所谓“三重证据”,是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来论证古代文化,用外国的、世界的东西来论证中国的情况。叶先生



认为，这对坚守“夷夏之防”、笃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国学传统而言，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而闻一多、郑振铎在郭沫若的影响下，继续将研究从古代史的领域推进到文学领域，尤其是闻一多，创获更为显著。此外，如鲁迅、朱光潜，还有不太知名的凌纯声，都被叶舒宪认为是应用人类学的“第三重证据”的重要学者。

对于古代文学的现代学术史上的这些重要人物，笔者没有全面了解，更谈不上研究，只是由于曾担任过一个集体的科研项目，而专门注意过闻一多先生，对闻先生在古代文学的学术成就、贡献作过“研究之研究”，与赵晓岚女士一起写成了《学者闻一多》这一专著，于前年在学林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凡是闻一多先生对先秦文学的研究都是由我作论析、评判的。因此，对他在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古代神话、诗经、楚辞的别开生面，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对他在文字考释、名物训诂上运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方法，而取得与前人不同的成就，也有了初步的了解。确实，闻一多先生在运用以弗雷泽为代表的巫术理论、“食产文化理论”、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性文化理论”等方面，写出了关于上古神话和诗经的一系列论文，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在当时，不少学者认为他的研究是“非常可怪之论”，并未得到普遍性的首肯。在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后，我们不能不佩服他至少两方面所进行的开拓：其一，用“生殖崇拜”考察上古神话的“人种起源”的文化学意义；其二，从图腾研究切入探讨中国的国家起源和相关的民族问题。这样，他对于世界上所有古老民族都有过的相似的“传古民歌”的三大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借助新的理论、方法和眼光，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使愈来愈多的人为之钦敬、信服。

今天，我们对于“三重证据法”的命名或许并不完全、真正的认可，因为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中的“地下之材料”，是包括秦汉以后各时代的出土文物，而“三重证据法”中的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的田野调查等所得材料、证据，都主要是用以观照人类的初年的（虽然说，文化人类学包含了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分支，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并不为历史的时段所限，但更多的运用于对上古的研究）。但是，叶舒宪、萧兵等先生对先秦文学的研究，无疑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突破。试看湖北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著作，都可以称煌煌巨著。萧先生在1991年出版的《楚辞的文化破译》所附的著作目录有10种之多，而叶先生在其1994年出版的《诗经的文化阐释》后所附的著作目录，也有11种之多（其中3种合著，2种译编）。从年龄上讲，他们是两代人，但在学术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著作虽未必都论证、阐释得很正确，很严密，都令人信服（如叶先生对《诗经》的阐释，用一系列的咒语，如猎咒、情咒、医咒、反咒来看待诗经中的祝词式修辞模式尚较为信，但用咒和祝的分化看传统的“美刺说”的由来，就不很可信；认为“寺人作诗”与世界性的“净身祭司制”有关，似乎较可信，但儒家“温柔敦

厚”的“诗教”和君子理想、中庸说都脱胎于以寺人为本的“中人”伦理，则不甚可信；“颂”来源于原始的猎头和祭首礼，恐怕更难以令人信服。西方有所谓的“过度阐释”一说，即深求而至于过甚，这种情况在萧先生的书中也存在），但他们的探索精神无疑是很值得肯定的。

因此“三重证据法”的说法或许可以质疑，但这些学者用文化人类学来“破译”古代文化所取得的实绩确实是惊人的，是令人振奋的。

### 三、前辈大师的文化学研究方法给我们的启示

郭沫若、郑振铎、闻一多以来的许多学者，在先秦史学、文学、文字研究中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当代的萧兵、叶舒宪等新一代的学者在运用战后西方理论和调查成果、相关材料上，达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在先秦文学研究上产生出令前辈们至少在数量上是望尘莫及的研究成果，在方法上，更因时代的进步，也为前辈所不逮。举例说，如叶舒宪的《庄子的文化解析》，既在理论上借助西方艾利亚德、吉拉道特的永恒回归理论和爱利森的精神超越学说，又在方法上除传统的训诂考据外，充分运用了跨文化比较，对主题研究、原型分析等用得很纯熟。这种研究确实是大大超越了受到时代所限的前辈们。可是，正如前面所说，文化人类学的运用是有历史时段的限制的。因此，在秦汉以后的文学研究中，除与神话有一定亲缘关系的小说外，恐怕很难再产生出如同“系列破译”那样的成果，因为此后的文学创作，更多的是在理性的烛照下。

如果不为名词所限，本着前辈学者的开创精神，在当代学者勇于探索的启发之下，我们尽管不采用“三重证据法”的说法，或不限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但沿着文化学的研究路子，应该说还是可以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有所创造，有所建树的。

我们不妨看看20世纪上半叶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大师们，他们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

讲到20世纪初以及随后的大师们，我们不得不感叹他们的建树，试以民国时期为例，尽管当时也充满了动乱、战争，但此期学者在学问上的成就却是了不起的，仅由今人编辑的一套“民国丛书”就可以看到当时的学术底气。而这些大师们，又是由他们的老师引领进学术殿堂的。以梁启超言，就不能不说到康有为的影响。康有为虽立足于经世致用，发挥公羊家“三统”、“三世”说以求托古改制，终于成为了改良派的领袖，并非书斋中的纯粹学人，但他对经学、史学、理学、佛学、考据学、今文学都有精深造诣，对诗词、书法、绘画也有很高的创作或鉴赏水平。他当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古今学术源流”，是出入于儒、法、道、佛和西学间，如张伯桢《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前言》所言，是“综博群籍，贯穿百氏，通中西之邮，参新旧之长。”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说：“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他说康有为当时正

写《公理通》、《大同学》，又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还有宋元、明儒学案、《文献通考》、二十四史等“日课”。因此，康有为所从事的是我国传统的“通儒”、“通人”之学，却又跨越了中西、新旧的界限，与传统之学不同。后来，梁启超所从事的学问研究也基本沿着这条路走。所不同者，在于康有为并没有将自己所讲写成专著，他的育人目的在于造就推行改良主义政治主张的人才，而梁启超虽所学多出康氏，却自己另有树立，又不讳言与老师的分歧。

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概括，从特定的角度而言，我们应看到他的具有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眼光。他看到了西学中的近代学术（尤其是自然科学）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因而有“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的看法，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游历了欧洲，看到了西方的另一面，遂认为“科学破产”，因此他的学术思想有尊古崇儒的倾向，这种倾向或有失客观，却有利于对民族遗产的倾心研究。他还认为，更新中国的学术思想，在于博采中外之长，在面对近代以来的落后时，应不为近代“外国学术思想所眩”，不应自贬，应该做到将中西学术融会贯通。先秦诸子，两汉到宋明的儒学衍变，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近 300 年学术思想，是梁启超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就文学而言，梁启超除了在倡导诗界革命、小说革命等方面提出了许多著名的见解外，他的文学研究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如果说他在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时，还是将《诗经》作为材料来用，那么他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就是纯文学的研究，且具有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学、历史学等方法。在萧兵的楚辞研究中，就曾用了他关于古代社会政教合一的观点，以此观照楚国文化和楚辞中的一系列问题，由此可见方法论的典范作用。

王国维以其个人特有的气质治哲学，不是接受康德的思辨性哲学，而是接受叔本华的具有东方色彩的哲学。他对于悲剧的看法，对《红楼梦》的研究，对元杂剧的研究，《人间词话》的创新等，都可以说是具有创新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西方悲剧论和理念说的影响，同时也熔铸了东方佛学所原有的“境界”概念。他用与传统不同的游戏说、解脱说、距离说、天才说、审美静观说、纯文学论、文艺无功利论等看待文艺，并以此为标准和参照来论中国古代文学，从政治道德和南北文化论屈原文学精神，论俗文学以“自然”、“意境”相取等，也为 20 世纪古代文学研究起了建立导航标的作用。但是，在王国维所作的以西方哲学、美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工作中，不是生硬地以西释中，而是沿用传统的民族形式，在着盐于水、寓神于形的论述中，将新的理论用于惯有的形象描绘和直觉把握，重在归纳而非分析，只求点悟而非阐释，使人在旧形式中感受到新内容，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尽管王国维的治学转入其他领域，但他的文学研究所具备的哲学、美学眼光和文化学色彩，一直都给人以启迪。

又如鲁迅，他于 1907 年写成《摩罗诗力说》，尽管多为编译，写作之旨也在思想解放、推助革命，但其中对封建文学及其创作思想的批判，对异端、尤其是对“摩罗诗派”

“不为顺世和乐之音”的推崇，对“雄桀伟美”的浪漫主义的呼唤，“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向西方汲取，对反思和扬弃，对确立评判标准，都有“导夫先路”的作用。此外，《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的运用西方美学观念、文学思想，以纯文学思想对“文学”概念的全新、系统的解释，是对其师章炳麟关于文学的概念的一大发展。章氏《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云：“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而鲁迅则以“用思想以美化天物”为“美术”（即文学与艺术），这非但对 20 世纪的文学创作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对研究古典文学也是观念的一大转变。鲁迅不仅在上世纪初以其杰出的文学思想鼓吹革命，而且在研究古代小说、魏晋文学等领域，也成为了文学研究史上的典范。其中一些主要观点，如中国人的重实际而黜玄想，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代，以及用佛学的进入中国来研究小说的演变等，也多有这些文学领域的文化学研究之开创性意义。因此，鲁迅先生虽长期以来被塑造成思想家和战士的形象，但如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等，都是拓荒性的，郭沫若就曾将他与王国维相并，认为他的小说研究和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前无古人，而且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再比如陈寅恪，也是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诗文释史和以史释诗已是人所公认，学科的交叉性使之在治学上有不少创获。如以元、白诗证史，以韦庄《秦妇吟》证黄巢起义事，以钱谦益、柳如是诗文证明末清初史实，均可补正史所不载；反之，以史证诗则对正确理解作品也大有助益。运用在语言学、宗教学上的优势，对某些问题作词源性的考证，是陈寅恪先生所独有的贡献。如认为三国的名医华佗，其名应来自天竺语 *agada*，原意是“药”，汉译脱去字首元音“a”，即成华佗，而华佗原名华寡，人们以其医术高明，故比之为印度的药神。又如考证出竹林七贤的“竹林”是假托佛教名词 *Veluvana* 的译语，为佛祖说法之处，七贤谈玄，以之比附，遂有竹林之游的说法。因对道教的熟悉，他考证出晋朝凡名字带“之”字的都是道教徒，这对研究晋朝的思想、文学都很有帮助。陈先生以《西游记》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的原型都出于佛经，所说有理有据，是胡适等人所论的发展。他从地域文化和出身门第的角度研究唐代政治史，写成了重要的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不但探寻了党争之由，对唐代文学的研究也很有启发、帮助。其论韩愈和古文运动，提出了韩愈旨在尊王攘夷的观点，也为人所未发。

对近代以来的古代文学学术史而言，其代表人物很难一一陈述和论定。记得钱穆先生曾过说，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因此中国多通人、通儒之学，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学术走向“分别”之势。这一说法既对，又不全对。比如，上面说到的这些人物，多为“通人”，是现代的“通儒”，而他们之所以能突破乾嘉学派许多朴学学者终生治一业、“窄而深”的研究格局，与他们的不囿于传统学术方法，具有现代的文化意识有关。确实，“别求新声于异邦”应不止于思想史的意义，前辈大师们可以给予我们足够的启示。

## 参考文献：

版社，1992.

[1] 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

[2] 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莱薰阁书店，1934.

**Dual and Triple Evidence Methods and Others****—— Informal Discussion about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DENG Qiao-bin

(Chinese Depart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WANG Guo-wei advanced: dual evidence which is used for combining the document based on materials on paper with new underground material from archaeological relics combining QIAN JIA school's textual criticism method with the new scientific method of the western capitalist revolution, "One neither yields to old and follow the new, now inadequate the new to follow the old", it acquires outstand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Contemporary scholar YE Shu-xian advanced: Triple evidence that is to say to use anthropology research achievement to verify ancient literature, use foreign and words things to verify Chinese condition. The author thought that the noun of "Triple evidence" is query, but it is excited to use cultural anthropology to comment the achievements gained from ancient literature. If not restricted by the noun, and following the senior scholars, WEN Yi-duo and ZHENG Zhen-duo, for example, initiative spirit, encouraged by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 enlightenment, even if without the adoption of "Triple evidence", or without restriction of the method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So long as we pursue the way of culture science, we should make creation and contribution on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LIANG Qi-chao, WANG Guo-wei, LU Xun, CHEN Yan-ke, many others were all academic masters who left us with enough inspiration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into ancient literature.

KEY WORDS: dual evidence; triple evidence;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of culture science

(责任编辑：阎自启)